

# 非虚构性及历史性：“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考察

魏宏远<sup>\*</sup>

〔摘要〕叙事是“论诗及事”诗话的基本表述方式，此类诗话以“非虚构”叙事、“小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为主，与小说、传奇、野史等有很大不同，对事件细节、情节不作过多铺叙，呈现碎片化叙事特质，从“见证者”视角叙事。“论诗及事”诗话追忆诗事，记录古诗生长的语境及存在状态，诗话之“事”可将读者带至古诗产生时的历史空间，对古诗历史时空场景还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阐释古诗若过于强调审美性、注重诗歌内部结构分析就容易造成脱离历史语境的“误读”，或作品阐释的自我封闭，或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

〔关键词〕诗话；论诗及事；历史性；非虚构性；纪实性

“论诗及事”诗话通过记录或追忆历史，将古诗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一问题以诗事的形式予以呈现。“论诗及事”一说源于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sup>①</sup>章学诚将诗话理解为因诗歌而引发的谈话，认为诗话源于谈诗专著《诗品》，并据“经传”谈诗涉事或谈诗涉议论，而将诗话分为“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两类，显然前者偏重“叙事”，后者偏重“说理”。从“论辞”和“论事”层面将诗话分为两类，确实把握住了诗话的内在特质。这一分类方法得到了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赞许，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指出：“仅仅论诗及辞者，诗格诗法之属是也；仅仅论诗及事者，诗序本事诗之属是也。诗话中间，则论诗可以及辞，也可以及事；而且更可以辞中及事，事中及辞。”<sup>②</sup>也就是“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互有交错。许学夷说：“宋人诗话种种，不能殚述，然率多记事，间杂他议论，无益诗道。”<sup>③</sup>诗话纪事间杂议论，为解诗及解读诗人生活提供了“史”的意识。郭绍虞在《清诗话·前言》中又将“论诗及辞”、“论诗及事”诗话称为“钟派诗话”和“欧派诗话”，前者以叙事性较强的欧阳修《六一诗话》为代表，后者则以论诗为主的钟嵘《诗品》为代表。

<sup>\*</sup>文学博士，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730000。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明诗话新编”（13&ZD115）、兰州大学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中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15LZUJBWZX017）阶段性成果。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8页。

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③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335页。

诗话是有关诗歌话题的谈话或诗事追忆,对指导诗歌创作实践、理解古诗、还原古诗历史时空场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随着现代学术的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诗话的理论性,一般观点认为“论诗及事”诗话的逻辑性、理论性不强,多为感悟式、印象式的批评而给予较低评价。其实,诗话得名之初即是“以资闲谈”,在这些谈话中会有很多饶有趣味的诗事追忆。这些诗事往往讲述诗歌的创作缘起、写作过程、社会影响等,具有私人化、生活化的纪实特质,便于读者从创作者所处生活场景及人生际遇来解读古诗。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理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阐释古诗时越来越偏爱或刻意突出审美性、理论性,或侧重古诗自身结构的内部分析,这就造成忽视古诗历史语境的去历史化理论分析倾向,这种去历史化、强化古诗自身结构的解读会造成很多鉴赏式的“误读”。为避免这一“误读”的发生,一些研究者努力从古诗产生时的历史语境去寻绎促使古诗生产的历史性因素,不过要想进入古诗产生时的历史语境,“论诗及事”诗话的价值和意义便非同一般,原因是此类诗话所载诗事为历史时空的建构和还原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为此,本文拟从历史性、非虚构性层面探讨“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以期学界对此类诗话的特质及价值予以较多关注。

## 一、叙事:“论诗及事”诗话的基本表述方式

“论诗及事”诗话讲述、记录“诗事”,叙事性是此类诗话的一大特性,《蔡宽夫诗话》说:“事之琐末者,皆史氏所不记,惟时时于名辈诗话见之。”<sup>①</sup>说明诗话所记是史书所不载的日常琐事。诗话这一特性对文学事件的书写、人物关系的链接、文学生态的还原等有史书所无法替代的价值和意义。诗话不同于史传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话本、传奇、小说、野史等虚构类作品的想象叙事,其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目的等都是围绕存诗、记诗展开,因诗纪事,因事存诗。此类诗话的碎片化叙事往往不具连贯性、统一性,侧重对下层、边缘性群体的记录,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群体性行为。

“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属非虚构的“小叙事”,却以“史笔”和“史才”为之,文徵明《南濠居士诗话序》说:“诗话必具史笔,宋人之过论也。玄辞冷语,用以博见闻、资谈笑而已,奚史哉?”<sup>②</sup>吴騫提出:“昔人论诗话一家,非胸具良史才不易为。”<sup>③</sup>说明诗话的叙事不同于一般的叙事,且自有传统,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序文说:“诗话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sup>④</sup>《温公续诗话》承继了欧阳修《六一诗话》的“记事”套路,沿袭了“欧派诗话”的发展脉络。在“论诗及事”诗话中题名“纪事”的诗话所占比重较大,宋代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清代厉鹗辑撰《宋诗纪事》、罗以智辑《宋诗纪事补遗》、陆心源辑《宋诗纪事补遗》、陈衍辑撰《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陈田辑撰《明诗纪事》、今人邓之诚编《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编《清诗纪事续编》等,这就形成了诗话的纪事体制。此类“纪事”诗话内容驳杂,就《唐诗纪事》来说,书中搜罗的内容非常宽泛,将唐代“三百年间文集、杂说、传记、遗史、碑志、石刻,下至一联一句,传诵口耳”,乃至“名山胜地,残篇遗墨”,搜罗殆尽,以穷尽方式辑录,既辑轶诗,又收录本事和品评。胡震亨说:“计氏此书,虽诗与事迹、评论并载,似乎诗话之流,然所重在录诗,故当是编辑家一巨撰。”<sup>⑤</sup>诗话的这种“纪事体制”不同于以虚构为主的叙事,重在存诗存史。“论诗及事”诗话的叙事以“闲谈”和琐事为主,谈诗者为了使谈话内容风趣耐听,常常讲说诗歌故事,因此有别于以“诗教”为主的“经学”中的诗论。此类诗话在叙事时不是为了突出某一思想主旨或书写意图,往往一事一记,诗、事之间并无太多关联或意义指

①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卷下《蔡宽夫诗话》,第418页。

②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南濠居士诗话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1页。

③王夫之:《清诗话》下册《拜经楼诗话·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20页。

④何文焕:《历代诗话》,《温公续诗话》,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4页。

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向, 记事者似乎并没有特定的书写“意图”, 亦无太多情感倾向, 只因诗后有“事”, 才加以辑录。在叙述方法上将“诗”、“事”、“人”联系在一起, 叙事侧重非虚构性, 与小说、传奇等虚构叙事有很大不同, 叙事内容主要针对的是“诗”而非“人”<sup>①</sup>。此类诗话是有关诗的“话”, “话”不是“关于诗的意见和批评”, 而是关于“诗事”的讲述。当然, 有些诗话也不是以“话”为主、以“诗”为宾, 而是以“诗人”为主, “话”既可为诗的意见和批评, 亦可是为了讲述诗事, 甚至以后者为主, 这也算是此类诗话的一种特例。

“论诗及事”诗话既然以记事为主, 那么, 它是如何叙事, 与小说、传奇、戏剧等有何不同? “论诗及事”诗话叙事侧重碎片化的“小叙事”, 即以“小身份”叙事, 往往记录诗事中与诗有关的片段, 与完整记事的笔记、史书、传记等在表现方式上有很大不同。此类诗话近似笔记, 二者都是以见证者的身份叙事, 有些诗事本身就缘于笔记。不过在叙事上诗话与笔记也有很大差异。首先, 诗话的叙事内容较为集中, 主要是围绕诗展开的“话”; 其次, 诗话因事存诗, 以人系诗, 诗与事、人紧密相连; 再次, 诗话叙事有追忆往事的性质, 或为谈资, 呈现以存诗为主、叙事为次的倾向。当然, 与笔记相比, 二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 诗话具有“说部”的属性,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序》称诗话“体兼说部”。“说部”是指小说、笔记、杂著一类, 明显具有随笔札记的性质。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序说: “诗话之体原同随笔一样, 论事则泛述闻见, 论辞则杂举雥语, 不过没有说部之荒诞, 与笔记之冗杂而已。”<sup>②</sup>诗话不同于“说部之荒诞”、“笔记之冗杂”, 因“说部”以虚构为主, 而诗话具有纪实性, 这也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类“话本”不宜归入诗话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 诗话是否也可以纳入“野史”范畴? 很多人认为诗话“大略似野史”, 李易《诗话总龟原叙》云: “诗昉《关雎》, 诗话, 即稗官野史之类。”<sup>③</sup>诗话有口耳相传、道听途说的“闲谈”性质, 在此方面与“稗官野史”有相似之处。不过, 诗话与“野史”仍有不同: 首先, “稗官野史”的题材不限于谈诗, 诗话是以谈诗为主; 其次, “稗官野史”具有虚构性, 诗话则侧重纪实性; 再次, “稗官野史”内容复杂, 而诗话多为追忆师友的谈诗、写诗及录诗, 内容单一。章学诚《文史通义》说: “唐人诗话, 初本论诗, 自孟棨《本事诗》出, 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 而好事者踵而广之, 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sup>④</sup>他认为诗话源于论诗, 后来才发展为“史部之传记”。此外, 诗话与“传记”在叙事上也有很大差异: 传记虽有纪实性, 但无论是“纪事”还是“纪人”都强调事件的连贯性, 记载某一事件的完整始末; 诗话则围绕某一诗事来写, 诗完成后, 叙事也基本结束。这里以孟棨《本事诗》中“红叶题诗”为例:

顾况在洛, 乘闲与三诗友游于苑中, 坐流水上, 得大梧叶题诗上曰: “一入深宫里, 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 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 亦题叶上, 放于波中。诗曰: “花落深宫莺亦悲, 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 叶上题诗欲寄谁?” 后十余日, 有人于苑中寻春, 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 诗曰: “一叶题诗出禁城, 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 荡漾乘春取次行。”<sup>⑤</sup>

此则诗话在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都有写实性, 顾况之诗在《全唐诗》《唐诗镜》等中都有记载, 说明这一文学事件已被广泛接受。整个事件围绕题诗展开, 叙事过程并没有人物内心独白, 也没有人物对话, 仅为写诗与和诗。此类诗话叙事简洁, 情节单一, 以诗为主, 以事为宾。在诗话叙事中语言多为描述型, 而非分析型, 经常有和诗, 且事件情节平淡而不曲折。在“红叶题诗”这一文学事件中, 戏

①李孝弟《古典诗歌的叙事批评论——以诗话为中心》(《齐鲁学刊》2012年第4期)所讨论的主要是有关诗话对叙事性的论述, 本文探讨的则是诗话自身所具有的叙事性。

②郭绍虞:《宋诗话辑佚》,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年。

③郭绍虞:《诗话总龟后集》附录《月窗本序跋》,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第316页。

④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 第189页。

⑤孟棨:《本事诗》,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年, 第3页。

剧性的安排在于“后十余日”，有人于苑中又于叶上得诗。从中可以看出此则诗话只是截取了生活片段而成，且未交待顾况是否与御沟传诗的宫女谋面。后来一些人在笔记中再述此事，就对诗话的这种不完整性叙事有所不满，于是不惜再造“大团圆”结局，即补入顾况与宫女取得联系的情节：御沟传情未久，“安史之乱”爆发，顾况找到那位美丽的宫女，趁乱逃出上阳宫，一对有情人喜结连理。从“红叶题诗”结局的添补反映出诗话叙事的碎片化特质。另外，诗话叙事往往是从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将叙事语言与诗性语言结合，诗随事件的进展而变化。诗人的创作就是使本事成为诗，将陈述性、描述性语言演变为诗性语言，不过诗话此种叙事缺乏情节、对话、动作、内心描写等，与小说、话本等以虚构性为主的作品差异较大。

## 二、“论诗及事”诗话的“非虚构”叙事

“论诗及事”诗话是见证者对自身遭遇的当下史记录，真实而富有时代感，具有诗史意义。夏基《隐居放言》自序云：“因其事录其诗，因其诗传其事，而诗话作焉。”<sup>①</sup>诗话中“诗”与“事”互为表里，诗因事作，诗话的记事使后人可知古诗缘何而起，对解诗有着重要的意义。朱彝尊说：“或因诗而存其人，或因人而存其诗，间缀以诗话，述其本事，期不失作者之旨。”<sup>②</sup>诗话对诗“本事”的叙述有益于建构历史人物新的存在关系，上文所引孟棣“红叶题诗”就是通过题诗将诗人与宫女联系在一起，在这一事件中诗是核心和关键，对事件情节起着推动作用，而与诗无关的事件细节则被忽略。新人物关系的建构有利于将文本事实与历史事实融合起来，同时“红叶题诗”也展现出那个时代诗歌是一种普遍化的存在，具有沟通人物关系的意义，说明古诗是生长在现实生活之中，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

“论诗及事”诗话通过叙事，最大程度地呈现事件的客观真实性；借助对细节的追忆，以引起人们对事件背后所隐藏历史事实的思考，有很强的“非虚构”书写倾向。此类诗话所载主要是诗坛掌故或围绕古诗所发生的文学事件，这对理解古诗生产及文学现场的还原具有重要意义。沈琳惠说：“诗话作而诗存。”<sup>③</sup>其实诗话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存诗，更在于存史，在于保存记录者的历史记忆。因诗话纪事多为吉光片羽的断章短什，具有随事记忆、以非虚构为主的特质，这就使诗话成为见证者自身遭遇的记录或讲述。诗话这种历史性记忆，以事系诗，以诗存事存史，记录日常生活中的诗事。诗话的非虚构性不仅仅在于传达资讯，更重要的是记录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及一些社会事件。通过文人的日常交游展示出现实生活细节，交代人物关系，以对人物、身份和事件的实录，展现现实世界的存在方式，并随时间推移而验证世界的变迁。

“论诗及事”诗话因纪事录诗的非虚构性而被视为“诗史”，张鼎思在其所撰《豫章诗话》序文中说：“此非徒说诗也者，盖诗史也。……先生之诗话，词不拘拘于月露，音不察察于宫商，矩获是绳，文献具在，故余谓之史者，为其论之正也。事核则考时微事者取衷焉；论正则稽品论世者取衷焉，夫谓之史，不亦宜乎！”<sup>④</sup>事实上，很多诗话的叙事就如史书的“实录”，记录事实，指向现实，以笔记的方式截取生活中所遇诗事。吴伟业《梅村诗话》就是从见证者视角记录了明清易代之际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存状态，对死节的陈子龙、瞿式耜等有重点记述，诗事与诗彼此参证，特别是对钱谦益、龚鼎孳等人记载尤详，以实录笔法展现当时的文学生态，以诗事补史书之缺。王士禛《渔洋诗话》也有“见证”

①夏基：《隐居放言》自序，清刻本。

②朱彝尊：《明诗综》序，清刻本。

③王夫之：《清诗话》，《寒厅诗话》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97页。

④郭子章：《豫章诗话六卷》，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属性,记载了作者主盟文坛时的交游及神韵说流行盛况,作者序云:“康熙乙酉,……武林吴宝崖(陈琰)书来,云欲撰本朝诗话,征余所著。……乃以余生平与兄弟友朋论诗及一时诙谐之语可记忆者杂书之,得六十条。”<sup>①</sup>这种以“实录”来追忆往事,以亲身经历来勾勒当日文坛景况,更具真实性。林昌彝《射鹰楼诗话》的现实意味浓厚,“射鹰”一词为“射英”之谐音,首二卷专辑反英之作,“详于射鹰,而有关风化者次及之,论诗又次及之,采师友诗又次及之”<sup>②</sup>。书中辑录师友诗句批判时局,有强烈的反列强入侵色彩。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始末多以诗事记载,时事性、政治性较强,书中记载了莫友棠撰《屏麓草堂诗话》、郑方坤辑《全闽诗话》等事,颇具史料价值,以事系诗,诗事互证,对陕西农民起义、四川军务、云南民变等也以诗事存史。

明人胡之骥在《诗说纪事》中指出诗话的“纪事,纪余身历其事者”<sup>③</sup>。诗话记载者以见证者的身份和视角讲述诗事,娓娓而谈,较为可信。王闿运《湘绮楼诗话》记载了同光时期文人的诗酒唱和,以亲历者身份辑录诗事,有较高史料价值。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也以见证者视角讲述倡导维新者、“诗界革命”者如康有为、黄遵宪、严复、谭嗣同、丘逢甲等人诗事,对新诗的兴起,以及轮船、火车、电报等新名称入诗现象给予较多关注,对清末民初“诗界革命”有“实录”意义。

诗话中的诗事在口耳相传中,讲述者以亲历者的角度叙事,听者往往信以为真,“非虚构性”是其重要属性,因这一属性而使一些以虚构为主的“话本”或“说话”虽有“诗话”之名却不被视为诗话。自欧阳修《六一诗话》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始用“诗话”之名以来<sup>④</sup>,以诗话题名者有两类作品:其一为谈诗笔记,其一为有诗有话的“话本”。前者取名“诗话”,以资谈诗,名至实归,以纪实为主;后者虽取名“诗话”,却无谈诗之实,实为以“虚构”为主的“话本”或“说话”。有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何取名为“诗话”,王国维提出:“其称诗话,非唐、宋士夫所谓诗话,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sup>⑤</sup>方诗铭赞同王国维这一说法,指出:“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所以称为诗话,是因为有诗有话,这与宋代的小説或讲史完全一样,其韵文部分是需要用乐器伴奏而歌唱的。”<sup>⑥</sup>李时人等在探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何取名为诗话时说:“《取经诗话》题名中的‘诗话’,并不是标明它的体裁。其另一刻本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可证‘诗话’可能并非原书题名的固定组成部分。或许原本《取经诗话》同于某些敦煌写卷,并无题名,由于一般南宋人不了解唐、五代变文话本的形式,仅注意到书中人物‘以诗代话’的特点,于是名之‘诗话’,以此表示它和当时流行话本的不同。”<sup>⑦</sup>如果以诗话为题,却不表明“体裁”,似乎也不妥,因以诗入话在话本、传奇等中多见,这一类作品是以“诗”代“话”,或引“诗”入“话”,或以“诗”服务“话”,或以“诗”从属于“话”,这与《六一诗话》以“话”从属于“诗”、以“诗”为主“话”为宾有形式上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差异是前者以“虚构”为主,后者以“纪实”为主。

### 三、“论诗及事”诗话叙事的历史意义

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序文中提出:“诗与史,相为终始者也。记载为史,而词咏亦为史。……

①王夫之:《清诗话》,《渔洋诗话》序,第164页。

②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序,清刻本。

③胡之骥:《诗说纪事》,明刻本。

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成书时间学界有争议,刘德重《诗话概说》提出:“欧阳修以《诗话》名书,民间有一种话本也题作‘诗话’,当亦属‘无心暗合’。”(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5—56页。

⑥方诗铭:《〈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宋人说经话本考》,《文史杂志》1945年第五卷第7—8期。

⑦李时人、蔡镜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前言,第4页。《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宣扬佛教故事的“话本”,20世纪初在日本发现,目前有两种版本:其一题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其一题名《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

然则朱先生之为是书,诗话乎?史乎?余且以为史耳。……爰推先生所以作书之义,而序之如右。诗,史也;诗话,亦史也。则是书其为咏歌之史也夫!”<sup>①</sup>诗话的“历史性”主要表现在对古诗的生产语境及存在环境的历史还原,此类诗话记录事实,指向现实,是见证者记载自身遭遇的“当代史”,这种“历史性”对阐释古诗具有很高的价值。诗话内容庞杂,因多载诗“本事”而被视为“野史”,“尤袤《全唐诗话》,犹见故实之繁,计氏《唐诗纪事》遂启诗征之例,则本事一派,进而与史乘争鞭矣。”<sup>②</sup>徐英认为《唐诗纪事》为诗话“本事一派”,其史料价值可与“史乘争鞭”,也就是诗话能够与史书媲美。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认为诗话可“通于史部之传记”、“通于经部之小学”、“通于子部之杂家”,<sup>③</sup>也就是诗话具有“经、史、子”诸部的复杂属性,当然,有些诗话被列入“集部”的“诗文评”类。此外,诗话在“传记”、“小学”、“杂家”等中也有著录,有的被归入“文史”类。诗话的不同文体属性说明其内容的复杂,而“论诗及事”诗话值得关注的是对古诗生产历史的记载、对古诗生产的诗学环境的记录。此类诗话以“话”为主,这些“话”提供了古诗生产的历史信息,在“话”的背后蕴含着古诗生长的历史属性。

在诗话越来越走向诗学、诗话学的过程中,“论诗及事”诗话以“闲谈”的叙事形式多为人所诟病,人们在强化诗话理论性的同时,往往忽视了诗话的“历史性”,这不利于诗话历史时空场景的建构和还原。当然,孟棣《本事诗》一类诗话是以“话”为主、以“诗”为辅,不过很多诗话却是“话”少“诗”多,有些甚至是为了选诗、存诗、辑诗而取名为诗话,这些诗话所能提供的历史场景信息相对来说较为稀薄。陈一《说》:“诗话实是以‘话’为主,以‘诗’为副。‘话’是个人关于诗的见解和批评,则‘诗’不过用作引证而已,否则岂非与选诗专集无异。”<sup>④</sup>这一主张强调诗事,重视对古诗产生历史的记载。张麟年提出:“何为诗话?人以诗来,吾以话去。以吾之话,解人之诗,所重在话,诗次焉。近人好作诗话,往往诗多话少。取长篇大简,堆叠行间,首尾加几句诗话套语,而诗话能事毕矣,果诗话邪?”<sup>⑤</sup>这种强调以“话”解诗,实则注重对古诗由来的关注。诗话到底是以诗为主,还是以“话”为主?“诗”与“话”的比例应如何安排?不同类型诗话的情况各不相同,其中“论诗及事”诗话是以“话”为主而非以存诗、选诗为主,这是此类诗话的重要特质。那么,诗话与诗选、“话”与“诗”应是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因有“诗事”而成诗,还是因有“诗”而后才有“诗事”?对此袁枚有这样的谈论:“殊不知诗话,非选诗也。选,则诗之佳者,选之而已;诗话必先有话,而后有诗。以诗来者千人万人,而加话者,惟我一人。搜索枯肠,不太苦耶?”<sup>⑥</sup>这说明诗话不同于诗选,“必先有话”,然后“诗”与“诗事”相伴而生。“诗”因“事”而成,诗话是对“诗事”的记录。这样“论诗及事”诗话就能够为后人还原历史时空场景,还原古诗产生时的语场:一首作品由何而来,针对何事而作?围绕这一事件又形成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些在诗话中一般都会有交代,如唐代孟棣《本事诗》就记载了“红叶题诗”的诗事,此事在《古今诗话》《全唐诗话续编》《说郛》《古今说海》《古今事文类聚》《云溪友议》《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唐诗纪事》《苕溪渔隐丛话》《玉芝堂谈荟》《樵李诗系》等中都有记载。在此则诗话中,顾况因宫中流出题诗的红叶而作诗,如果将顾诗与此事割裂开,那么,对诗作就会有多种理解。若将两首诗联系起来,宫女宫内写诗,文人墙外和诗,通过流水和红叶,宫女与文人建构起一个文学场,这一诗歌世界的建构突破了世俗中的性别、等级、习俗等禁锢,通过跨时空的对接,拼接起一个艺术世

①赵慎珍:《静志居诗话序》序,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页。

②徐英:《诗话学发凡》,《安徽大学季刊》1936年第1卷第2期。

③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第189页。

④陈一《说》:《诗话研究》,《天籁》1935年第24卷第1期。

⑤张麟年:《一虱室诗话》卷一,清刻本。

⑥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91页。

界。在这一文学场,写诗已不是文人的专利,宫女缘于寂寞生活的独特感知以诗抒怀,与墙外青年才俊有了心灵的碰撞和对话,这样处于文化权力边缘的宫女与墙外的诗人同样拥有了写诗的权力。此则诗话题诗地点是在御沟,诗话中的人物为宫女和文人,围绕题诗宫女与文人建立起了联系,在这一由诗而生发的关系中,诗人与非诗人以诗为媒介进行了一场心灵的沟通和对话。从此则诗话中,可以看出古人的诗歌往往是因生活际遇而作,古诗并不是静静生长在文本中,宫女之所以能够与文人进行心灵沟通,宫墙内外的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之所以能够对话,都是因为诗的存在;同时通过诗,文学的中心与边缘有了融合和沟通。

“红叶题诗”诗话为我们理解顾况的诗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如果这些历史信息被遮蔽,后人解诗如同猜谜。“论诗及事”诗话能够为后世的解诗提供具体的历史语境,通过此类诗话可将古诗置于历史场景进行解读,建构起古诗的历史世界以便后人对诗歌产生的文学场进行还原。如果脱离古诗的历史语境,仅从审美性或诗歌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就容易造成解诗的所谓“可解”、“不可解”、“不必解”等谈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提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sup>①</sup>诗的“不可解”或“不必解”其实放大了读者阐释的权力,容易导致过度阐释。叶燮《原诗》说:“若夫诗似未可物物也。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sup>②</sup>古诗内敛含蓄,一字千金,言不尽意,意在言外,后人在解诗时会有很大随意性,所以叶燮有此“未可物物”之说。古诗言简意赅,留白甚多,其妙处难以言传,理解古诗需不断添补所缺历史信息,不过若脱离古诗生长语境任意想象,诗中空缺信息很可能会被任意建构,这样就容易导致所谓的“不可解”或“不必解”,甚至被演变成过度阐释。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说:“吾读杜十年,索杜于杜,弗得;索杜于百氏之诠释,愈益弗得。既乃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矣。”<sup>③</sup>所谓“摄吾之心,印杜之心”虽不失为一种解诗方法,但容易偏向用作品去印证解诗者的某种思想意图或某种文学理论的预设,谭献说:“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sup>④</sup>可是当读者完全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解读文本,把与文本相关的其他历史信息隔断,就容易导致文本自我封闭,而以解诗者的“前理解”去阐释文本,文本只是成为印证解诗者某一思想或意愿的正确可靠的证据,文本成了第二位,解诗者的思想意图成了第一位。因此,古诗若被切断历史语境,就容易或过度阐释,或“强制阐释”。如果能够从“论诗及事”诗话所载历史信息去解诗,就可消除这种猜谜语式或武断式的解诗,避免去历史化解诗的弊病。

“论诗及事”诗话将我们带至历史深处,其历史信息为我们触摸历史提供了便利,对古诗产生时的历史语境提供了有效还原。一般来说,古诗创作者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而灵感的触发又有其特定的场域,通过具体作品进入古诗生产时的文学场,从而进入古诗产生时的历史时空,“论诗及事”诗话能够为读者提供由其自身所在时空进入另一历史时空的便利。如果没有孟棣“红叶题诗”的记载,我们仅从顾况的诗很难还原其与宫女和诗的场景,只能就顾况作品来阐释其艺术世界,且因古诗跳跃性大、留白多,读者需对诗中的空白进行填充,并依据自己的“前理解”来建构、还原和想象作者的艺术世界。因此,掌握古诗的产生语境更便于我们对古诗的客观解读,同时也便于把握围绕古诗生产中所存在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由此生发出的文化事件。

①谢榛:《四溟诗话》卷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1页。

②王夫之:《清诗话》,《原诗》卷二,第584页。

③浦起龙:《读杜心解》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④唐圭璋:《词话丛编》第四册《复堂词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987页。

当然,“论诗及事”诗话多是创作者或当事人自身经历后的追忆,这些历史信息负载了追忆者或讲述者自身的理解。可以看出,一首古诗自身的信息固然重要,其所连接的历史信息对理解作品也至关重要。如果隔断这一作品的诸多历史信息,那么这一作品或不可解,或被过度阐释,会造成历史信息的稀薄以及审美性脱离生活的去历史化倾向,同时因过于强调理论和审美性而造成鉴赏式的简单化结论。因此,通过对古诗生长语境的历史还原来探讨“论诗及事”诗话的“历史性”有利于搭建理解古诗的历史平台。

总之,“论诗及事”诗话产生之时血脉中已融有“叙事性”、“非虚构性”和“历史性”的基因,随着时代的发展,诗话的理论性逐步增强,并不断被后人突出和放大,诗话逐步向诗学靠拢,甚至被发展为“诗话学”。在诗话的理论性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论诗及事”诗话已显得有些落寞。鉴于此,发掘“论诗及事”诗话叙事中“非虚构性”和“历史性”意义,对古诗的理解和历史时空场景的还原具有重要的价值。此外,从“历史性”和“非虚构性”来把握诗话的内涵及特质,对理解古诗创作的发生、传播、文人生活及心态都有重要的意义,这样可以将古诗放在生活史、文化史和学术史层面展开探讨,将古诗生产机制的诸要素建立起新的联系。通过对这些要素关系的梳理来探讨文学的发生、传播和影响,既可拓宽对文学及生活关系的理解,亦可提升诗话及古诗研究的文化史意义,同时从“见证者”角度来把握诗话,有利于对诗话内涵、边界的清理及对史书缺漏的填补。

(责任编辑:邓晓东)

## An Exploration of Historical and Non-fictional Narratives in *Shihua*

WEI Hong-yuan

**Abstract:** Narration is the basic form of the type of *shihua* 诗话 (literally remarks on poetry) which incorporates into the poetic criticism a narrative of the story related to the writing of the poem at issue. This type of *shihua* is characterized by nonfictional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small incidents concerning the poems at issue. The narratives in *shihua*, differing from those in novels, legends and anecdotal history, usually offer a fragmentary rather tha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witness. The function of such narratives is to help the readers trace the process of how the poem at issue came into being and keep a record of its developmental context and its state of existence. It can bring the readers back to the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in which the poem was produced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storing to the readers the historical time and space embedded in the poem. More importantly, it can help avoid various misunderstandings of classical poems, which are usually caused by the factors in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s such as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aesthetic property and the inner structure of the poems, the divorce between the poems and their historical context, and the ov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tic texts.

**Key words:** *shihua*; poem-related narrative; historicity; non-fiction; documentary